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 歷史的變局

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

錢庠理 著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總序·金觀濤)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總約六百萬字，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
- 十餘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歷時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注重國際與國內重大歷史事件關聯，揭示中央決策與地方、基層之間的互動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 第五卷

### 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

錢庠理 著

從1962年起至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是一個色彩紛呈、複雜變幻的時段，有人稱其為「變局」。這種「變局」，是在大躍進運動遭受重大挫折、外部世界對中國施加愈來愈大壓力的局勢下，中國人在理論、觀念、政策作出一系列變求存的調整和應對而發生的。它根本改變了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歷史的走向：那些最為重大、最為精彩的政治變動和思想流轉，都發生在這個時段；同時，它又開啟了更為激烈變動的十年。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ISBN 978-968-172745-9



9 789881 727459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

# 歷史的變局

——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  
(1962-1965)

錢庠理 著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

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

錢庠理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8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88-17274-5-9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全球發行及總代理：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新界·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箱：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5***

***Historical Turn: Responding to Crisis and***

***Combating Revisionism (1962-1965)*** (in Chinese)

By Qian Xianglei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17274-5-9

Publisher: Researc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g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 總序：世紀視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金觀濤

經過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終於分批出版、與讀者見面了。對我來說，也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一直把能否出版一套忠於史實、觀點開放的中國當代史視為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

把當代中國人經歷的驚心動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我們這一代人和人民一起經歷了苦難，又見證了啟蒙時期思想的風雨雷霆，這一切理應成為不可磨滅的歷史。然而我深知這一工作又是多麼困難。

首先，作者必須掌握盡可能完備的史料，特別是檔案文獻。近年來，出版了大量回憶錄和口述歷史資料，但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與中共高層決策有關的檔案至今尚未完全開放，為寫作帶來困難。在歷史學家的寫作中，除盡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外，更為複雜和重要的，是對史料的辨偽和確定其在決策過程中起過的作用，只有少數長期關注該領域的專家才具備這種能力。十分幸運的是，本套書的撰寫正是依靠了這批有深厚檔案功底、又長期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專家。他們足跡遍及全國各省及市縣檔案資料館，搜集整理檔案並對史料辨偽。史料之豐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書的重要特色。

歷史研究者的目標是追求歷史的真實，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搜集史料、整理檔案只是第一步。歷史學家在研究和寫作中都會有這樣一種體會：如果不能做到對歷史場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內心

重演歷史事件展開過程以及理會當時支配事件展開的普遍觀念，就無法接近歷史的真實。本套書以1949年至1981年中國大陸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論述主線，這二十餘年正是毛澤東思想支配中國的時期，發生了世界歷史上獨特的令人很難理解的現象，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由於本套書的作者都是中國近幾十年巨變的親歷者，完全了解這些事件發生時的社會氛圍，這就使他們具備了某種比西方史家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優勢。當然，作者要發揮這種優勢，僅僅停留在感性階段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從某一種意識形態中走出來，盡可能價值中立地審視過去，達到反思的高度，以獲得超越的視野。開始注意到支配社會行動的普遍觀念與重大社會事件的互動，特別是這些事件是如何從中央決策到地方、再到基層展開的，是本套書的另一特色。由於各卷作者是獨立寫作，分批出版，雖然現在對全套書作出整體評價尚為時過早，但是，我可以不無自豪地說，中國人終於開始為不尋常的二十世紀中國撰寫大型歷史著作了。

一開始，我們就決定不設主編，以便各位作者在寫作時有更大的自由，並表達多元的價值。由此帶來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統一風格，使十卷著作組成連續的整體。我們的解決辦法是在動筆之前充分討論各卷內容，每年舉行一到兩次工作會議，切磋寫作中碰到的問題。至今，我仍不能忘懷一次又一次的國史寫作討論會。窗外是北國的寒冬，大家聚集在不大的會議室中不分晝夜地討論，最後形成會議紀要。這一場景使我想起1970年代末青年時代和朋友的徹夜長談。很多時候，大家就某一觀點、細節甚至是提法，進行無休止的辯論。使我十分感動的是，無論在討論中發生多大的爭論，甚至是立場和價值上的分歧，最後都能在忠於歷史事實之上得到統一。根據時段，本書大約以兩三年為一卷，每卷由一位或兩位作者撰寫，而其他作者都把自己對該時段的見解和史料提供給該卷作者，整個寫作過程中表現出一種今日中國學術界罕見的真誠合作精神。在此意義上講，這套書是整個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

組織編寫和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這套書

的出版，首先要感謝沈志華和李丹慧夫婦，從確定撰寫計劃到尋找適當的作者以及整體工作的協調，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組織者。其次，我要感謝青峰和先後在《二十一世紀》編輯室工作的同事黎耀強先生、林立偉先生、張志偉先生、朱敏翎小姐和張素芬小姐。他們在青峰的帶領下，以巨大的熱忱和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投入編輯出版工作，否則，如此繁重而浩大的編輯出版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還要感謝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為本書作者提供的支持和熱情周到的服務。最後，我要感謝方正兄，該書從醞釀到出版，一直得到他在精神上和各方面的支持。他雖已退休數年，但仍念念不忘這套書的出版，認為它對香港中文大學有着重要性。在這些中大同事身上，我仍可以感受到高錕教授任中大校長時期那種注重中國研究在當今世界意義的「中大精神」。

這套書出版之時，我也到達退休年齡，將開始人生的新階段。我想指出的是，由於可以看到的檔案和其他種種限制，這套書只寫到 1981 年。如果不談此後發生的波瀾壯闊的 80 年代啟蒙運動，以及由此引發的 1989 年震驚世界的事件，我們仍無法理解今日中國和世界。在這一意義上，僅僅由前十卷組成的二十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不完備的，寫史的任務並沒有完成。中國從來就有忠於事實和敢言的歷史傳統，但很少有史家為當代寫史，故這套書的出版是一種新現象。它說明中國歷史學家已走出僅僅用春秋筆法褒貶益損，並展示了一種可能性，這就是歷史反思意識已經產生，並開始指向新的深度。我期待着後繼者。

2007 年 12 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 目錄

總序 .....	金觀濤 ix
導言 .....	1
第一章 天人之惑 .....	23
一 問天 .....	24
二 問地 .....	33
三 問人 .....	42
第二章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七千人大會」及其圍繞大會所產生的分歧 .....	51
一 為甚麼要開七千人規模的大會 .....	52
二 一致耶？分歧耶？ .....	66
三 矛盾與選擇 .....	78
四 分歧在延續 .....	95
1 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本身的質疑 .....	100
2 對錯誤表現形式的揭露 .....	101
3 對錯誤發生根源的認識 .....	101
4 挑戰「大躍進」的指導思想 .....	102
五 劉、毛、林：三個各有「弦音」的講話 .....	104



六	並非尾聲的高潮 .....	138
1	工農業生產高指標到底發生在甚麼時候? .....	141
2	關於「第二次躍進」的起因 .....	142
3	關於高指標產生的影響及其糾正之困難 .....	143
4	關於產生錯誤的原因 .....	144
5	關於「反傾向鬥爭」 .....	145
第三章 「非常時期」 .....		151
一	西樓會議 .....	151
二	重設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	159
三	著名的「五月會議」 .....	167
四	非常措施 .....	173
第四章 包產到戶：中國社會主義初期的一個癥結 .....		179
一	歸去來兮責任田 .....	179
二	「河北有個胡開明」 .....	189
三	風起高牆 .....	195
四	攤牌 .....	202
第五章 調整風雲 .....		209
一	甄別平反與糾正錯誤 .....	209
二	彭德懷上書風波 .....	221
三	「脫帽加冕」 .....	226
四	早春天氣乍暖還寒 .....	239
第六章 緩和與霜凍 .....		245
一	出現緩和 .....	246
二	平波之下的湧浪 .....	251
三	王稼祥的建議書 .....	261

第七章 重提階級鬥爭 .....	267
一 何來憂患? .....	267
二 「東臨碣石有遺篇」 .....	271
三 「警鐘長鳴」 .....	280
第八章 抓住龍尾 .....	289
一 尋找階級鬥爭 .....	290
二 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有了綱領 .....	297
三 夾縫中的經濟調整 .....	305
四 階級鬥爭樣板 .....	308
五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 .....	313
六 劉少奇動了「真格」 .....	320
第九章 對決 .....	331
一 引火線 .....	332
二 反擊 .....	342
三 破裂 .....	347
四 「三家條約」 .....	355
五 公開論戰 .....	358
六 赫魯曉夫下台 .....	365
七 斷裂 .....	371
第十章 緊張的政壇 .....	377
一 批鬼戲 .....	377
二 批「兩界」 .....	383
三 「兩個主席吵架」 .....	395
四 「二十三條」 .....	404
五 醞釀「新革命」 .....	407
六 點火 .....	412

七 羅瑞卿事件之謎 .....	419
<b>第十一章 面對「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世界 .....</b>	<b>433</b>
一 走向大分化 .....	433
二 「最冷的冷戰」 .....	441
1 關於中國的核武器計劃 .....	444
2 中美敵對的第二個問題：越戰的迅速升級 .....	451
三 尋找更為廣闊的戰略空間 .....	454
四 「動盪」和「分化」環境下中國國內經濟運行的突然轉軌 ...	459
五 國際與國內政治的一種特殊交互作用 .....	473
<b>第十二章 需要「精神」的時代 .....</b>	<b>481</b>
一 時代精神的樁柱 .....	482
二 時代精神的標誌 .....	488
三 時代精神的異化 .....	497
<b>後記 .....</b>	<b>509</b>
<b>附錄</b>	
大事記 .....	515
參考文獻 .....	527
索引 .....	533

# 導言

也許，用外部世界對中國的觀感，可以避開人們習慣了的歷史思維定勢，從另一個角度勾勒二十世紀60年代前半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面貌。這種辦法，如同從地球觀察月亮或其他太空物體一樣，由於陽光的折射，使它們顯得更立體、明亮和透徹。

如果從本卷開端的1962年講起，那麼有這樣幾件事情，是中國以外的世界所難以忘卻的：

第一件事。

1962年年中，從廣東省深圳以及大陸同香港毗鄰地區，越界私逃香港的人數突然猛增。在高峰期，一周的外逃人數幾乎等於此之前一年的總數。香港警方當時極為震驚，試圖強力加以阻止。但私逃客如過江之鯽，「破網而入」。據今天見到的一些材料透露，從1954年到1978年，廣東全省共發生偷渡外逃56.5萬人次，逃出14.6萬多人。其中，1962年的偷渡外逃是第一個「高潮」。當時，廣東全省共發生外逃事件11.7萬多次，逃出3.9萬多人。這樣一個數字，同1979年上半年發生的最大規模的逃港事件相比，其成功出逃者的數量仍要多出近一萬人。<sup>1</sup>毫無疑問，因為有了這樣一大批人湧入香港，香港的1962年夏季，變得緊張、惶惑和繁忙了。可以想像，那些偷渡者們隻

---

1 楊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廣東群眾偷渡問題研究〉，全國黨史系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身或多人鋌而走險，從一切可以出境的地方，用一切辦法走向一條可能是不歸路。他們絕大多數是來自廣東、福建的農民。在他們眼裏，香港就是天堂。那裏有飯吃，有錢賺，也更自由。為此，他們付出了慘重代價：拋家捨親、東躲西藏、慘對牢獄、平遭白眼。可這一切他們都忍了。

大陸人大量私逃香港，不僅讓港英方面措手不及，更讓美國人震動。開始時，美國情報部門搞不清為甚麼這時會有這麼大量的大陸人，在一個非常集中的時間突然湧向香港？繼而，他們猜測，是大陸政府有意而為，縱容人們逃亡香港。不管怎樣，美國人對這個突然而來的「外逃潮」疑慮甚多：大陸中國究竟發生了甚麼？那裏的飢餓狀態到底達到了怎樣的程度？中國共產黨政權是否還能有效地控制社會？人民的反抗情緒到底有多高？台灣蔣氏父子一直在試圖反攻大陸的計劃真的有了可行之機？

後來，美國人認識到，大量的大陸人集中外逃，基本原因就是飢餓。不管進行怎樣的評估，大陸人的飢餓程度和範圍，還是超出了一般人想像。這一點，是美國人從逃港的大陸人那裏逐漸獲得大量第一手情報，才最後予以證實了的。他們當時曾得出一個結論，即大陸的經濟困難和糧食緊缺，將可能引發大規模的動亂。對共產黨政權來說，這將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不過，美國高層並沒有因此而制定某種行動計劃，來立刻顛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政權。他們還是保持着「冷靜觀察」的態度，靜觀事態的發展。

歷史證明，美國決策層的這種態度是明智的。中國雖然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挫折，雖然人民的生活曾一度極端困苦，但國家沒有發生動亂。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合法性仍然是人民的最高認同。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間有廣泛的號召力。人民相信，領導他們推翻了舊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中國共產黨，仍然是這個國家的領導力量，是國家富強和社會安定的希望所在。甚至，共產黨在領導人民糾正所犯錯誤，在努力實踐社會平等的諾言時，人民對共產黨反而更加信任和熱愛了。在1949年後的整個時代，這完全是真實的。

因此，美國人不但沒有採取「顛覆」動作——這是通常大陸中國人習慣接受的意識形態宣傳——企圖在那個特定時期趁亂搞垮「紅色中國」，反而在60年代初期的對華策略方針上，逐漸有了「現實」的苗頭。所謂「現實」，就是傾向於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現實存在——在此之前，美國政府至少在對外宣示上，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實存在的。可是，在1962年前後，也就是肯尼迪政府開始執政後，他們有所變化。在那時，他們甚至改變了對中共政權的稱謂，正式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這意味着，美國決策層意識到了早晚要同「紅色中國」打交道。無視這個共產黨統治的大國，是沒有道理的。二十世紀60年代美國的對華政策中蘊含的這種微妙變化，現在仍未細緻嚴謹地為中國大陸的主流歷史話語所接受。這多少有些遺憾。

儘管如此，美國從1962年中國內地人大量逃港事件中，還是獲得了很大的好處。在此之前，中國大陸是極端封閉的。外界很少能透過冷戰鼓吹者所宣揚的所謂「鐵幕」，看到中國大陸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而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中前期，通過大陸大量逃港人員，美國情報部門終於獲取了關於中國內地情況的真實情報。這些情報經匯總、梳理和分析後，以摘要形式報送給總統。今天，研究者可以沒有任何阻礙地在美國檔案館裏看到這些情報彙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情報彙集在美國最高決策中曾發生過重要影響。從這一意義上說，1962年大量內地人出逃香港，不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面臨的政治經濟局勢，同時也造成了一種「蒲公英現象」：被風吹起的蒲公英，搖搖曳曳飄向遠方。它們把稀缺的信息帶到了外界。那麼，這些信息究竟怎樣影響了外界對中國的看法？它又怎樣涉及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以及這種信息所包含的寓意，在中國內部反映的是甚麼樣的矛盾衝突與現實發展，就將是我們所特別應予關注和揭示的了。

第二件事。

1962年10月20日，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發生武裝衝突。中國軍隊迅猛突破印軍構築在中國境內的地堡工事，擊潰和俘獲了大量印度軍事人員。之後，中國軍隊又迅速撤回到實際控制線後二十公里，並宣布停火。這件事瞬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

《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作者澳大利亞人馬克斯韋爾，他對中印邊界衝突作了這樣的評論：「中印邊界爭端是二十世紀中葉國際關係史上富於戲劇性的一段。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亞洲的兩個偉大的新共和國，儘管政治性質不同，似乎已經走上和睦合作的道路，但後來卻為了幾塊荒涼的、艱險的、沒有甚麼價值的土地爭吵起來，還打了一場短促而劇烈的邊境戰爭。印度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由此一落千丈。」<sup>2</sup> 這個評論表達了當時世界上相當一些人對中印邊界衝突的觀感。印度是不結盟運動的發起國。尼赫魯總理有着極端強烈的大國欲望。他拒絕同當時相互冷戰的兩個集團聯繫在一起，而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本來，尼赫魯的目標很明確：如果要集中發展本國經濟，就需要在北方同中國保持一條友好、和平的邊界。然而，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使他變得輕率固執起來。他執意要把歷史遺留的有爭議的邊界問題，看成是民族尊嚴和自尊心的重大問題，從而不惜一切地要在他認為的屬於印度領土的那些沒人居住的高山上，向中國一方推進，挑起戰爭。不幸的是，邊界衝突使印度支出了巨額軍費，並在軍事失敗的後果中，損失了本來應有的國際國內威望。同北方強大的中國交惡，也在地緣因素和社會經濟發展方面遺留了惡果。因此有評論這樣說：「支撐尼赫魯的各項政策的拱門整個垮下來。尼赫魯的統治地位也會隨之告終。」<sup>3</sup>

中印邊界衝突對中國也造成了影響深遠的複雜後果。已有大量著作對這場短暫戰爭進行過描述。但如果從世界對這場衝突的看法而言，中國當時卻承擔了更為沉重的壓力。因為，無論蘇聯還是世界的輿論，都在給中國施壓。而在這其中，與中國有着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聯，不但不站在中國的一邊，反而以所謂的「中立」立場，譴責了中國的行為。早在1959年8月底朗久事件發生後，塔斯社就不顧中國方

---

2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Maxwell Neville）：《印度對華戰爭》，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71），頁1。

3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上冊，頁1—2。

面的勸阻，堅持發表了一個聲明。聲明表面上對兩方都未傷害，只是說蘇聯對所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並對有人（指西方報刊）利用這個事件離間兩個亞洲國家關係、破壞和平共處的思想而感到惋惜。可在中國人看來，蘇聯的做法非常值得懷疑：既然中蘇是同盟國家，為甚麼你蘇方要發出這樣一個不問是非曲直的聲明？朗久在麥克馬洪線中國一側，而你蘇聯卻對衝突雙方表示遺憾，這就在事實上偏袒了製造事端的印度一方，是在實際上「拉偏手」。

中國堅持認為，蘇聯這樣做，是出於它正同美國人進行的「示好」行為：赫魯曉夫像孔雀一樣，張開它美麗的尾羽，向美國人展示自己的亮麗。可是，正如中國的一個俗語所說，孔雀再美麗，也無法在張開尾羽的同時，掩飾住難看的屁股。赫魯曉夫當時極為自信地聲稱，他已經找到了一種辦法，可以把作為解決國際爭端手段的戰爭徹底消滅掉。而在1959年整個夏季，赫魯曉夫都在尋求同美國建立起一種新的關係。當年8月，他完成了自己十分得意的美國之行，號稱建立了「戴維營精神」。正在這樣一個興致勃勃的時候，發生了中國同印度的邊界衝突。之後的三年裏，中印之間在荒涼的喜馬拉亞山麓和帕米爾高原上緊張對峙，直至發生1962年大規模軍事衝突。赫魯曉夫似乎有理由認為，中國的行動「破壞」了他「戰爭可以避免」的諾言。而中國則認為，蘇聯的立場是有意貶損中國。赫魯曉夫宣稱的美麗的「三無世界」，不過是一廂情願。他的「拉偏架」的做法，猶如孔雀的屁股，是掩不住它的醜陋的。

冷戰中結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共同的意識形態取向與不同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幾乎在一開始就困擾着這個陣營。即使是在意識形態方面，人們事實上也難以作到「鐵板一塊」。50年代的波蘭、匈牙利事件，充分說明了「陣營」沒有強求的統一，只有「壓服」下的歎息。而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在共產黨陣營的整個對內對外策略上，形成了巨大的分歧點。特別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更造成了中蘇、蘇東國家之間極大的意識形態爭端。此外，人們對永遠服從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頭」——蘇聯的意志，各具自己的想法。更何況，所謂共同意志，長期以來大都



對蘇聯有利。因此，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間的矛盾，不可能融解和調和，正如中國的那句老話所說，這是「禿子頭頂上的虱子，明擺着的」。

事實上，中國早在1956年前後，就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了。不管這條路是否真的找到了，但中國試圖擺脫蘇聯的行動「軌跡」是明顯的。至少，中國不想亦步亦趨地跟隨蘇聯。特別是在沒有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世界，人們敢想、敢說和敢做的欲望被大大激發了。對毛澤東本人說來，以他的獨特經歷和性格，特別是在他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中所獲得革命成功的威望，使他不可能屈從斯大林後輩們的意志。他理所當然要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進程中做出一些不同凡響的業績來，用他自己的那句名言說，就是「他們（蘇聯）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

在國家現實利益上，中蘇之間也有深深的芥蒂。且不說老沙皇，就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30年代中對中國的所作所為，也是對中國欠賬頗多的。東北、新疆，鐵路、貿易，令毛澤東和中共屢屢感到不快和激憤。因此，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態度，不僅使中國難堪，更令中國人感到憤慨。中蘇之間關係「鬧掰」的伏筆，已然被種下了。1960年2月6日，蘇共中央在一個通知中說：「以為印度這樣一個在軍事和經濟方面遠比中國軟弱的國家，真的會妄想對中國發動軍事進攻，進行侵略，那是完全不嚴肅的。」<sup>4</sup> 這段話是在中蘇分裂之後被「揭發」出來的，成為中蘇意識形態和國家關係破裂的一個重要證詞。當然，蘇聯的這一看法，暴露了他們同中國之間完全不相融的國家利益立場。這種分歧，由於國家利益而變得更為不可調和了。當時中國認為，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蘇聯公開偏袒印度，不但將中蘇矛盾暴露給世界，而且突出了中蘇之間已經存在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蘇分裂可以說同中印邊界衝突如影隨形。

在另一方面，中國還認為，印度侵略性質的「前進政策」，受到了美國的縱容，尼赫魯正在加緊向美國靠攏。有證據表明，從1947年到1959年的十二年中，美國對印度的援助總共有20億美元。而從

4 《人民日報》編輯部：〈蘇共領導聯印反華的真相〉，1963年11月2日。